■一周聚焦

坎昆气候会议能否成功

□谭焕新

11月29日，联合国第16次气候变化大会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是自去年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大会。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超过90亿。为适应人口的急速增长，避免气候危险变化，除了向全球低碳经济过渡别无他法。这也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坎昆气候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个20世纪，全球气温上升了0.7摄氏度，几乎每一年的气温都会比前一年更高。假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维持目前的标准不变，那么全球的气温仍将会继续升高0.5摄氏度左右，因为海洋温度改变的速度相对较慢，它们升温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事实上，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直在持续攀升。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各国都在就气候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但各国仍在按照原定的轨迹继续排放二氧化碳。

《哥本哈根协议》提出的目标是，世界各国应力争将地球升温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因为2摄氏度一直被视为是危险的门槛。多数签约的国家均承诺将采取行动降低碳排放。但国际能源署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排放标准，那么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3.5摄氏度。为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能源清洁化率控制在2.8%只是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清洁化率必须提高一倍，达到5.5%。这一标准显然很难实现。

从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气候大会到现在已经走过近20年的漫长道路，它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探讨，而是渗透了政治角力。部分发达国家企图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弱化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减排上的“共同责任”，希望脱离《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框架，另起炉灶达成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单一法律条约。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减排承诺、采取实际措施，是牵涉到一个国家短时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问题。

去年各方在哥本哈根达成共识，发达国家承诺在2012年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并承诺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人们希望在坎昆能就其落实作出安排。与此同时，人们也希望包括转让技术和促进转让的原则安排能在此次会议上取得积极进展。欧盟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快，据统计，今年欧盟已经筹集到22亿欧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它就是欧盟承诺的从2010年到2012年期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总计72亿欧元中的一部分。在坎昆气候大会上，欧盟还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来说明今年是怎样实现自己的承诺的。同时，欧盟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履行其减排承诺的透明度，以及发达国家将如何提供长期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透明度。

根据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发达国家的资金必须是额外的。但是，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只有部分是“额外的” 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ODA即“海外发展援助”资金。发达国家认为，适应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发展问题，ODA纳入气候变化资金渠道，是合理的；但是，发达国家也会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态度积极，但“打折扣”。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接受，则可能停滞不前，一无所获；如果表现一定的灵活性，敦促发达国家加大额外性，就有可能达成妥协。而且，资金问题的妥协还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三可）相关联。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表现出积极姿态，也会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三可”。对于发达国家资金所实现的减缓行动，接受“国际磋商与分析”不会有反对，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在“国际磋商与分析”的细节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有所保留。

众所周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排放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却一直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成为了新世纪全球气候行动的蓝本。可是，美国政府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最大国家退出，给这个全球气候协议以沉重打击。历时8年后，直到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会谈才逐渐恢复信心。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曾对媒体发誓，如果他当选将力促美国重新恢复全球气候行动的领导地位。奥巴马上台后，国际社会都在期待着美国国内的气候立法进程。因为有了《京都议定书》的教训，人们知道在美国国内没有完成气候立法的情况下让美国在国际会谈中签字，那个签字最后并不算数。但是，2009年美国气候立法的唯一成果只是《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以微弱多数在众议院被通过。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的气候立法进展非常不顺利。减排目标和各项减排措施不断被修改，目标不断降低，但仍然得不到足够数量的参议员的支持。到了2009年7月，美国就此宣布，无限期搁置参议院气候变化立法工作。

2010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不再，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可能难以将气候变化法案摆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提出的中期目标过于保守，无法使大多数其他国家满意，因此，即使该《法案》能够得以通过，也无法完全解决目前的谈判僵局。目前，要想在全球气候会议上达成最终共识，仍然必须得到美国的积极参与。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但到目前看来这个承诺差不多还是一纸空文。为了重新建立自己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和支持，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设置障碍。

事实上，任何缺少美国积极参与的国际气候制度都难言成功。然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要使美国国会通过并提出让各方都满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目标困难重重。因此，现行气候制度下的谈判僵局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作为重要的发展中排放大国，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维护并促进由“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谈判进程。但由于中国身为发展中国家，需要维护发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的态度对谈判走势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无法决定和控制谈判的整体进程。正视国际谈判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将有助于确定中国在未来的谈判中所应持有的基本策略。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指出，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可能都有一些困难。但是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不能因为自己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的原因，而推迟、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环球瞭望

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的麻烦

□仲 伟

在经过艰难谈判后，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签署有关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以替代去年12月到期的旧条约。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签约时确定，条约应同步在美国国会和俄罗斯国家杜马获得批准。目前俄国家杜马放行不存在太多问题，问题主要在美国参议院。美国共和党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急于求成，称新条约的谈判未充分考虑美国利益。中期选举前，民主党人就因条约难以获得国会参院2/3席位支持而搁置投票。

11月2日 中期选举后，共和党从执政的民主党手中夺回前几年丧失的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虽未掌控参院，但也新增了6个席位。中期选举后的国会已于15日复会，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初就职。奥巴马选举过后即向共和党伸出橄榄枝，呼吁两党今后通过妥协解决问题，并力求在新一届国会就职前通过美俄新条约。奥巴马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为条约要在拥有100个席位的参院过关，必须赢得2/3多数即67票支持。民主党本身票数不够，需要拉拢至少8名共和党参议员。如等到明年新一届国会开会，则需至少14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难度更大。所以，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奥巴马政府明显加大公关力度，全力推动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年内在国会获得批准。

美俄两国核武器目前占世界核武器总量90%以上。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7年内两国战略核运载工具数量将削减到700件以下 各自可部署的核弹头将减至1550枚，削减幅度近三分之一；两国进攻性战略武器只能在本国部署。其导言还声明，这项新条约为“分步骤削减和限制核武器提供了新动力”，是今后进一步核裁军的基础。在美俄领导人签署有关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的同时，双方还签署了美军穿越俄罗斯国境进入阿富汗的军事过境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军飞机每年可以实施4500次穿越俄罗斯国境的飞行，且无需向俄方交纳过境费。奥巴马对此表示，俄罗斯为解决阿富汗问题作出的贡献“非常重要”，这一协议为美国节省了大量金钱、资源和时间。因此，奥巴马政府把新条约视为其外交成果之一，是美俄关系的“基石”。

奥巴马上台伊始就认识到，美国今天所面临的主要威胁首先已不是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当前大敌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等恐怖分子与极端势力。可核武器对这样没有国界的敌人并不具威慑作用，却反而存在落入其手中 成为恐怖工具的危险。他明确地指出，尽管全球核大战的风险降低了 但是核恐怖的危险却是增大了 一旦核武器或裂变物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就将造成严重后果。此外，美国与俄罗斯削减核武器也可以阻止伊朗与朝鲜发展核武的道义权威。所以，奥巴马政府加大公关力度，力争年内通过该条约。

然而，条约却在参议院搁浅。半年已过，条约仅获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批准。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不仅要求重新审核条约内容，而且要求政府提供谈判记录，以便明确条约是否会限制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11月20日 奥巴马说，如果国会参议院不能在今年内通过这一条约，不仅将使美方人员无法对俄核武器进行核查，还将损害在伊朗核问题上与俄合作，使得经俄罗斯向阿富汗运送美军的通道前景堪忧，进而破坏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两党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努力成果。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通过核打击摧毁美国的国家，其大国地位全仰赖于可以与美国一论高低的战略核武库。在常规力量方面，尤其是在精确制导技术与打击能力上美国则有着俄罗斯难以企及的领先优势。因此削减战略核武器无损于美国保持其常规力量的优势，却可以以此阻止俄罗斯在核武研发方面谋取优势。11月18日 奥巴马专门在白宫请来一班两党元老推动此事，与会者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贝克和奥尔布赖特以及前国防部长科恩、佩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人。在与两党元老会谈时奥巴马强调，年内批准新条约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解释说，美俄新条约完全能够保持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同时允许美方向俄罗斯派出核查人员追踪其战略核武器。

11月14日，奥巴马向梅德韦杰夫承诺说，推动条约年内在参院过关是其政府“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由于得不到参议院的积极回应，奥巴马万般无奈之下转而借助外力给参院施压。他借参加里斯本北约系列峰会之机，寻求盟国领导人的支持，以求对参院共和党人形成舆论压力，使条约尽快获得通过。

专家对新条约获批持乐观态度。乐观的推测新条约批准时间不是今年便是明年上半年。一方面，条约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论据“无可辩驳”；另一方面，在条约得到军方和共和党知名人士支持下，共和党一些参议员继续阻挠会让人对其提出质疑。舆论认为，如果条约拖延到明年新一届国会就职以后讨论，党派政治可能会促使新任参议员提出重新举行听证会，以便他们了解和掌握相关情况，这一过程将耗时至少数月。但是，条约如不能获得批准将对美国外交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质疑美国削减核武器的意愿，使美俄关系“重启”进程受挫，降低俄罗斯在伊核等问题上的合作意愿等。

■热点透析

中美汇率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曹和平 毛振宇 闫 威

前述三篇文章讨论了中美汇率问题小史、中美汇率问题的美国国家观、中国国家观等问题。本文将从经济学的“技术”角度——一般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利益角度——政治经济学的综合上，超越中美汇率问题单边国家的局部观点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讨论中美汇率问题的人类利益解决途径，我们称其为中美汇率问题的“世界观”。毕竟，21世纪人类两个最重要国家的汇率之争不能在一般经济学理论百年进步后，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百年前的地方原地踏步。

抽象的自由汇率原则的局限性

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Heckscher-Ohlin Model），贸易双方以各自的要素资源禀赋（包括劳动资源）为条件，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来生产，结论是贸易比封闭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为双方带来的福利更大。贸易反映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怎样呢？新古典经济学的回答是：只要维持竞争性市场构造，汇率只是贸易后两国经济体的货币在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兑换率，同样需要按市场条件变化而调整。简言之，自由汇率是自由贸易的货币条件。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同时达到福利最大的结论事实上不包括福利得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讨论，福利最大是效益最大，能否保持公平，则另当别论。“经济学的两分法”，认为效益最大化模型构造内涵的政治经济学上的公平割裂了公平和效率问题。市场能够在达到效益目标的同时兼顾公平，是个已经被否定了的问题。

首先，自由贸易可以带来产业结构向比较优势领域的资产专用化调整，但不能带来职业满意度的良性调整。比如，中国在车间经济有比较优势，中国如果在车间经济领域将劳动和资源专门化后，将可能变成一个蓝领经济。长三角的江阴地区和珠三角的东莞地区某种意义上是这方面的两个典型。而美国有可能变成设计 研发、市场整合、信息集成、资本品设计、世界警察和理念标准制造的经济体，即一个白领管理专业户国家。洛杉矶和纽约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同时，中国大量的人才外流、设计能力滞后，美国制造业传统城市巨量失业，这能让中美两国居民同时满意吗？

其次，自由贸易的效益增加不能导致分配的公平程度增加。在长达三十年的增长中，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不是分配更为公平了，而是基尼系数更大了。一个经济学直觉就是，当纺织业的发展为不同地域的居民带来较为公平的效用分配的时候，房地产业的发展却为城乡居民带来了较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国际贸易也是这样：当中美在加工制造产品和日用制造产品贸易领域为各自带来较为公平的效用分配（还不是财富分配）的时候，中美在货币、资本品、品牌产品、专利产品、影像产品、文化产品、理念产品和价值产品等领域的贸易，却给双方带来了极不公平的后果。尤其是政治理念贸易，加深了美国的优越感和对中国的说教程度，简直是一得一失的贸易。

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技术分析在方法论上存在局限性。其一，技术分析方法的局限在于割裂效益和公平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析领域，在方法论上用前者代替后者。其二，关于中美贸易的后果之一——汇率调整机制——需要第三方的公正评判，而不是中美双方的国家单边利益评判。

政治经济学分析才能解决中美汇率问题

福利经济学在考虑一个抽象的社会设计者的问题时，不是最大化生产者利益，也不是最大化消费者利益，而是在给定技术和资源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社会收益——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利益。放在中美汇率争论上，调整汇率问题的方法论思路不是美国丢失了多少工作岗位，也不是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及低价损失，而是在给定资源条件（包括环境能源）和技术条件下，最大化中国和美国的所有经济人的福利。美国三亿人是人，中国十三亿人也是人，光考虑三亿人，或者光考虑十三亿人都是不公平的。

反映在货币汇率问题上，中美汇率问题的解决途径可以通过下述思想实验来思考。比如中国内地有31个省域等级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有自己的货币，但是独缺超越于各省市货币之上的人民币。如果在过去五年金融危机中上海经济体增长速度下降，青海经济体则因原材料贸易而增长速度加快。但三十一个经济体多年贸易的结果是多边贸易中多数经济体以上海币结算，上海要求在保持自己核心货币的基础上，由青海一方负有调整上海币对青海币的义务。如果青海拒绝做的话，上海则到处游说，认为青海在操纵汇率。试问一下，如果有一个第三方仲裁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让上海币和核心货币脱钩，出现一种省域经济体贸易结算意义上的非零售货币，问题将怎样？如果有一个人民币意义上的结算和零售共用的货币，中国的经济将又该怎样？

将上述思想实验放到今天世界经济体中，显然，解决中美汇率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美元首先须和核心货币脱钩，要不然，在最大化中美经济人的全局福利函数中，放给美国人的权重更大，这有违美国人人权的普世思想。但是，美国人敢吗？同理，解决中美汇率问题，需要中国人放弃和美国大户绑在一起，将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放进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所有经济体，最大化全球经济体中每一个经济人的福利，中国人有思想准备吗？完全可能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各路专家都会说，简直是书呆子气，那样干的制度成本多高啊，远水能解得了近渴吗？实际上，不要如此现实，当年德国人在放弃马克和欧洲汇率机制，同意使用欧元的时候，也有这样痛苦的选择。德国人不是百分之百地做到了，但是在上述方法论的方向上做到了。中美双方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应该从德国人的欧元制度贡献中获取一些有益的思考和行动。

中美汇率问题世界观下的解决问题思路

虽然下述思路还不到对策意义上，但可以为外围货币国家在和核心货币国家美国在讨论汇率问题上增加理论的力量。按照蒙代尔的观点，超越中美汇率问题解决的国别利益，站在世界利益基础上来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某种程度上超越国别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存在。蒙代尔认为，在国际货币缺失条件下，周期性的汇率失衡是难免的。但是，一个单一货币体系背后往往隐含一个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背后还存在一个统一的司法制度和中央行政实体。这在今天的联合国议事实体（而非决策实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资银行实体（蒙代尔语）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理解世界范围的世界银行和货币，国别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恐怕在短期不实际。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一个尝试。要建立最优货币区，首先是要区域内的核心货币和国别货币脱钩。在欧洲范围，以马克为基准建立的欧洲汇率机制，欧洲区核心货币马克与国别汇率形成机制脱钩，最终形成了超越主权经济的欧元货币区。一个直接的引申就是，在现阶段条件下，世界主要货币国家应引导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主导的世界汇率形成实验机制，让美元和核心货币在汇率形成机制上脱钩（国际化货币地位不变）。

一个可资借用的机制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其发行为实验国所共有（权重可计算）的、能够满足世界汇率形成机制的主权汇率基金——一种汇率核心货币，以使作为国别货币的美元和作为核心货币的美元脱钩。汇率核心货币不在商业银行间交易，仅仅为调整汇率之用。按照目前世界贸易占GDP比重和贸易经济货币流通比例，可以3000亿美元为基数逐年调整。在这种意义上，特别提款权可以是一种具体形式，待取得经验后，吸引世界范围经济体参与分享汇率核心货币的制度收益和汇率基金的财富收益。

以特别提款权形式存在的汇率基金可以第三方实体——超越主权经济实体——的形式解决汇率问题中的国别利益冲突，而不至于将其上升到政治层面。但是，特别提款权制度如能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各国借贷的财富，这种财富的合额借贷豁免和超额借贷收益也必然演化出其交易和储藏功能，其使用通过何种途径成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一笔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财富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当然，以汇率形式存在的世界核心货币，还只是一种基金性质的主权间借贷货币，离商业结算和零售流通的全货币地位还差得很远。但是，贸易经济在国别间拓展到如此规模，是1940年代设计四个世界经济协调引擎的领导人所没有想到的。今天世界经济协调领域的人需要给世界各国人民一个交代。世界贸易发展超越主权经济形式的协调机构也在呼唤21世纪的新形式。

不管怎么样，汇率世界货币的提议还只是个萌生的制度理念幽灵。但她是世界外围货币国家在汇率问题上向美国理直气壮申明自己理念，并能切中美国人狭隘汇率观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